

略论河姆渡文化

方 酉 生

河姆渡文化以河姆渡遗址得名,主要分布在长江下游的浙江杭州湾钱塘江南岸的宁绍平原。遗址发现于1973年,经1973年至1974年、1977年至1978年两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达2000多平方米。发现有陶、石、骨、木、玉、漆器等重要遗物多件,并发现大量的稻谷和一大批带榫卯结构的木质建筑构件,以及一口水井和20余座墓葬等。由于这些遗存具有时间早、文化内涵新颖等特点,因此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河姆渡遗址的发掘,是考古发掘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使人们认识到长江下游,同样有年代早到7000年以前的原始文化存在,而文化面貌却与北方中原地区迥异,这说明我国古代原始文化的产生是多元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摇篮,长江流域同样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摇篮之一。

一、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

河姆渡遗址位于长江下游的浙江杭州湾钱塘江南岸的宁绍平原,属余姚县罗江乡的河姆渡村。姚江从遗址的西部和南部流过,从姚江往东25公里即宁波市区,往西25公里是余姚县城,南面为四明山和河姆渡村隔江相望,遗址背靠丘陵,面对沼泽,面积约有4万平方米。遗址的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是靠近海岸的沿海平原,海拔很低,只有3—4米,属于沼泽地,土地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很适宜于种植水稻,而且由于林木茂盛,也是野兽经常出没之处,宜于狩猎,加上河网密布,水源充足,捕鱼也很方便,河姆渡文化的先民们,就长期生息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通过辛勤地劳动,创造出有鲜明地区特色的古代优秀文化。

遗址深埋于地表之下,1973年村民在修翻水站的施工中被发现,并于1973年至1974年^①、1977年至1978年^②经过两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共达2000多平方米,发现有陶、石、骨、木、玉、漆器等重要遗物多件,并发现大量的稻谷,一大批带榫卯结构的木质建筑构件,以及一口水井和20余座墓葬等文化遗存。由于这个遗址具有时间早、文化内涵新颖等特点,因此,很快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和高度重视。

河姆渡文化的主要分布地区,是在钱塘江南岸的宁绍平原,目前已经发现的遗址,计有余姚河姆渡、茅湖、鄞县辰蛟^③、宁波八字桥、舟山白泉、大巨等地。1976年春将这类文化遗存,命名为河姆渡文化^④。

江淮地域与隋炀帝的政治生命

何 德 章

隋炀帝杨广利用隋文帝分立诸子而坐镇江都 10 年的时机,收纳江淮人士与江南佛道人物,阴谋夺嫡,并有割据江淮的政治图谋。炀帝即位以后,一反文帝朝的统治方略与用人政策,重用藩邸旧臣,信重江淮人士及江淮人组成的军队,从而造成政治上的纷争。炀帝在隋帝国崩溃之际逃亡江都,正是因为他借重江淮人所致,而其阵营内部关陇人和江淮人之间的矛盾,最终造成了他身死国亡的悲剧。

一、江淮人士与晋王杨广夺嫡之谋

《隋书》61《郭衍传》:

(晋)王有夺宗之谋,托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谋事果,自可以为皇太子;如其不谐,亦须据淮海,复梁、陈之旧。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阴共计议。……衍又诈称桂州徕反。王乃奏衍行兵讨之,由是大修甲仗,阴养士卒。

时晋王杨广为扬州刺史,统领江淮四十四州,欲夺太子之位。杨广与心腹郭衍所谋之计,当即夺嫡不成,便“据淮海,复梁、陈之旧”,建一偏安割据政权。否则,勿需“大修甲仗,阴养士卒”了。

杨广夺嫡之谋,实由于其父隋文帝的统治策略所致。文帝取周建隋以后,为巩固其政权,分封诸子以为屏藩。《隋书》62《元岩传》:“高祖初即位,每惩周代诸侯微弱,以致灭亡,由是分王诸子,权侔王室,以为磐石之固。”开皇元年,即以第四子杨秀为蜀王、益州刺史,总管 22 州诸军事;开皇三年,以第二子秦王杨俊为秦州总管,“陇右诸州尽隶焉”;开皇十七年,又以第五子汉王杨谅为并州总管,“自山以东,至于沧海,南拒黄河,五十二州尽隶焉”^①。

开皇九年灭陈之后,文帝以秦王俊为扬州总管,总领淮河及长江以南 44 州军事,镇广陵。次年,江南豪族群起反隋,文帝又改调平陈隋军统帅、次子晋王杨广为扬州总管,“镇于江都,每岁一朝”^②。由皇子充任的扬州总管有统辖江淮各州总管之责。《隋书》64《杨异传》:异为吴州总管,文帝令其“每岁一与(晋)王相见,评论得失,规讽疑缺”。从开皇十年到夺嫡成功,杨广坐镇江都达十年之久。

出镇宗王为扩大势力,纷纷收纳失意沦落之士,笼络地方人物。《隋书》57《薛道衡传》:薛道衡因事配防岭南,“晋王广时在扬州,阴令人讽道衡从扬州路,将奏留之。道衡不乐(晋)王府,用汉王谅之计,遂出江陵道而去。”《旧唐书》72《虞世南传》:虞世南于陈亡后入长安,“时炀帝在

具,适用于水田操作之用。这种骨耜,用牛等动物的肩胛骨加工制成,取材容易,制作简便,又很坚固耐用,是劳动人民的一种发明创造。耜耕农业,已越过刀耕火种阶段,进到比较发达的耜耕阶段了。这从遗址中发现有一件陶塑的小猪和二件刻画猪图象的陶器可以作为旁证。喂猪的饲料,一般是农作物,养猪和农业是有密切关系的。艺术来源于生活,陶塑的猪和刻画猪图象的出现,已充分反映出当时现实社会生活中,农业生产的发达程度。

遗址中发现有刀、匕、小棒、陶纺轮、骨针、管状针、“织网管”等,说明当时纺织业已经相当发达,其中管状针和“织网器”的出现都比中原地区要早得多。

遗址中发现水上的交通工具划船用的木桨,说明当时已经有船只存在,船只既可作为水上交通工具,也可以作为捕鱼工具。当时使用的船只,可能是一种独木舟,可以想见,在生产工具较为原始、生产力尚为低下的情况下,要制作一艘木船,确实是不太容易的。

在遗址中还发现一只木质漆碗,这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一只漆碗,距今已约有 7000 年悠久的历史了。此外,还发现了玉和石质的璜、玦、管和珠等装饰品。无疑,尔后在这一地区发掘的良渚文化中,出现十分发达的玉器制造业,应该是与河姆渡文化分不开的,是在继承河姆渡文化制玉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绘画艺术方面,遗址中发现有两件双凤朝阳的雕刻图案,一件是雕刻在骨匕上的,一件是雕刻在象牙器上的,这是我国目前见到最早的凤鸟朝阳的图象。根据许慎在《说文》中记载:“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鸛后,蛇头鱼尾,鸂鶒鸳思,龙文虎背,燕颌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崑崙砥柱,濯羽弱水,莫宿凤穴,见则天下大宁。”凤是一种吉祥之鸟。双凤朝阳也是代表吉祥喜庆的意思。河姆渡遗址发现的凤的图象,与许慎所说的凤出于东方君子之国,应该是有某种渊源关系的。这种凤鸟从河姆渡文化开始,尔后几千年来,一直是南方长江流域人们的一种图腾或宗教信仰物,如长江中游的史前文化中发现的玉雕透空的凤^①,楚国发现有三头凤^②等。而北方中原地区,至迟从仰韶文化开始,是以龙的图象作为图腾或宗教信仰物的,如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现仰韶文化的蚌壳摆塑龙^③,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现龙山文化的陶盘内的珠绘盘龙^④,以及到偃师二里头夏代文化中发现陶器壁上的刻划纹龙^⑤,安阳殷墟发现的玉雕龙和制作成龙形的乐器石磬等^⑥。因此,中华民族应该是由北方的龙和南方的凤两种图腾或宗教信仰物构成的,中华民族的子孙,可以称为龙凤的传人。这与我们尊奉炎黄两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是一样的,我们都是龙凤的传人,也都是炎黄的子孙。

三、河姆渡遗址发掘的重大学术意义

在河姆渡遗址发掘之前,传统的认识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摇篮,长江流域古代是未被开发的荒芜之地,河姆渡遗址的发掘,是考古发掘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它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的耳目为之一新,认识到长江流域自身具有与北方黄河流域文化面貌完全不同的土著原始文化,在时间上的早晚也不相上下。最显著的一个特点是河姆渡文化已经开始人工栽培农作物水稻,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人工栽培水稻的地点之一,而且有可能是世界上水稻的发源地之一。农业生产工具是一种骨耜和木耜。还发现有当时驯养的家畜猪的陶塑和图象,以及发现当时的纺织工具和编织鱼网的工具等。居住房屋是一种颇具特色的木结构的干栏式建筑。河姆渡文化是迄今为止最早发明水井、水上交通工具木船(已发现划船用的木桨)及木质漆器,最早发现磨制精致的玉、石璜、玦、管和珠等装饰品。墓葬大多无墓坑、无葬具。

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代表物是凤鸟。总之,它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都是与北方黄河流域的原始文化迥然有别的,这说明中华民族原始文化的发展是多元的不是单元的,存在有几个中心而不是只有一个中心。当然,这并不否认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的影响、交往和联系。毫无疑问,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摇篮,长江流域同样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摇篮之一。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对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作出了它们各自的贡献。苏秉琦先生提出我国的原始文化有区、系、类型之说^⑨,是可信的,符合客观实际情况的。

其实,在浙江杭州湾地区,在河姆渡遗址未发掘之前,早在1936年就已经发现了良渚文化^⑩,它以崭新的文化面貌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但是囿于成见,人们把良渚文化看成是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传播过去的,或者是龙山文化在这个地区的一个变体,时间较北方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为晚。事实上,良渚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3310年至2378年之间,它的上下限年代都比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为早。特别是出土的玉器制作技术、丝织品技术、竹编木作技术等等,都远远超过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河姆渡遗址的发掘,为长江下游原始文化的发展序列,竖立起一根可靠的标尺。根据地层迭压关系和器物形制的变化,这一地区的原始文化发展序列是河姆渡——崧泽——良渚。客观的事实证明,在杭州湾地区,确实具备一支有全新发展序列和内涵的原始文化,它与中原地区同时代的原始文化相比,各有特色,但并不逊色,而且在某些方面,比中原地区更为先进,这是有实物资料作为见证的。

为什么在浙江杭州湾地区出现如此发达的原始文化呢?笔者认为,这是与当地具有良好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一般并不否认优越的或恶劣的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发 展所起到的巨大促进和延缓作用。特别是在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为低下的古代,情况更是如此。河姆渡文化分布在杭州湾地区宁绍平原,正如上述已介绍的,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和环境,因此能够产生出古老的优秀文化是不难理解的。除长江下游的杭州湾地区宁绍平原之外,太湖流域、长江中游的鄂西地区、江汉平原地区,以及南方的珠江流域和东北的辽河流域等,都产生有优秀的古代文化。中华民族灿烂夺目的华夏文明,就是在这些多源头的基础上聚集、汇合起来的。

以往还有一种认识,认为中原地区所以有发达的原始文化的原因,是由于中原有疏松的黄土,在生产工具较落后的情况下,易于开发的缘故,这种意见并没有错,但没有想到人类是有很强的适应自然环境、战胜自然环境的能力的。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就给我们打开了另外一种模式,即在江南多雨低湿的环境中,人类同样能够充分利用天时地利、因地制宜地创造出十分优秀的原始文化来的。珠江流域、辽河流域等能够创造出优秀夺目的原始文化来,其原因也在于此。

至于外国一些别有用心心的所谓“学者”,提出所谓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北来说、南来说的谬论,在铁的事实面前,统统可以彻底休矣!

河姆渡文化的发现,把我国长江下游原始文化的早期,推早到7000年以前,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人们宣告,长江流域同样有古老的原始文明,同样是中华民族古代文明的摇篮之一。它不但为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作出巨大的贡献,而且也为世界的古代文明,作出重要的贡献。

为了永久性的保护遗址,让河姆渡遗址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关部门已经在河姆渡遗址的发掘现场,修建一座遗址博物馆,供人们参观,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河姆渡遗址博物馆的建成,必将为弘扬我国优秀的古代文明,作出重要的贡献。

注 释:

- ① 《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
- ② 《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载《文物》1980年第5期。
- ③ 《浙江宁波市八字桥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载《考古》1979年第6期。
- ④ 《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座谈会纪要》，载《文物》1976年第8期。
- ⑤ 1986年夏笔者亲自考察所见。
- ⑥ 《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载《考古》1980年第3期。
- ⑦ 《龙山文化玉凤》，载1988年6月17日《中国文物报》第24期(总第86期)第3版。
- ⑧ 《三头凤试释》，载《江汉考古》1989年第4期。
- ⑨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1988年第3期。
- ⑩ 《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载《考古》1983年第1期。
- ⑪ 《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载《考古》1965年第5期。
- ⑫ 《安阳殷墟五号墓的发掘》，载《考古学报》1977年第2期；《殷墟出土的陶水管和石磬》，载《考古》1976年第1期。
- ⑬ 《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载《文物》1987年第5期。
- ⑭ 《良渚》，浙江西湖博物馆，民国27年(1938年)。

(责任编辑 吴友法)

(上接第66页)

抗日战争前，我和汪铭竹、常任侠、孙望等结过一个新诗社，还办了一个新诗半月刊——《诗帆》，后由于抗战爆发而停顿，但诗还在写。这一时期所写部分新诗，连同沈祖棻的新诗集《微波辞》，去年承陆耀东教授搜集，编辑成《沈祖棻程千帆新诗集》，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顺便说一句，对此我对陆教授和武大出版社是非常感谢的。)从40年代起，我以教授古典文学为专业，于是又将搁笔多年的古诗拾了起来。写诗寄托了我的悲欢，也深化了我对古代诗人的理解。十年浩劫，诗稿丢失大半，反复记忆搜寻，还存二百多首，现编成《闲堂诗存》一卷，附在《被开拓的诗世界》一书之后。如果说我的那些诗论还有一二可取的话，那是和我会作几句诗分不开的。

方法不是万能的，也不是绝对的，但要从事学术研究，要尽可能正确地理解、批评纷繁复杂的多种文学和其他学科中的现象，又离不开研究方法这把刀子；一个人的治学方法，也许另一个人不会也不必完全适用和赞同，然而，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我还是希望今天在这里所讲的，能给在座的从事文学或其它学术研究的同志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谢谢大家。

注 解:

- ① 《文心雕龙·物色》
- ② 苏轼：《聚星堂雪引》。
- ③ 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
- ④ 《论唐诗诸家源流(答陈完夫问)》，见陈兆奎《王志》卷二。
- ⑤ 金说载陆以湜《冷庐杂识》卷七。

(责任编辑 张炳煌)